

# 民族文学现场的精神守望

——评石一宁的《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 □张淑云

石一宁以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等多重身份活跃在民族文学现场，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两个领域均有较高的建树。他的新著《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2021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是中国民族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石一宁一直跋涉在民族文学的征途上，把评论的疆域与视界延展了再延展，研究视野宏阔与细微兼得，文字中透着温润清明的学者风范。石一宁始终寻找和观照着少数民族学者的精神故乡，锲而不舍。他的评论既有锋芒，也有沉稳，彰显出一位壮族学者的精神超越性和文学现场的整体把握能力。

长期以来，石一宁一直以埋头耕耘、不计功名的努力，坚守在民族文学现场，在超越前人和自我的探索之路上，留下众多沉甸甸的成果。《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是石一宁多年来进行民族文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形成了富有个性化的学术建构，体现了精深的生命气度。全书精选了57篇论文，共分五辑，第一辑是对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第二辑至第五辑分别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影视文学等体裁作品进行个案研究。这部著作全面而清晰地展现出石一宁独特的学术研究历程，为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自己的思索和见解。《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为中心，从理论探讨到个案研究，描画出一幅多彩的民族文学景观，为民族文学研究领域打开了一种新的视野，展现了民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批评实绩。一个评论家既有微观的解析，又有宏观的审视，这无疑是深厚功力和学养积淀的结果。

全书收录的57篇论文，突出清晰的学术思路，体现了独特的研究视野。《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发展机遇》《丝路语境中的少数民族文学》《文化间性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篇章，以深刻的认识和极为宏阔的视野，开辟了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境界。石一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华美学精神，强调中华美学是多民族的美学，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美学是中华美学的有机和重要的构成。他对民族文学现场的思想与评说无不基于“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这样的理论基础，在挖掘各民族文学创作独特的美学价值与意义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如何用民族文学书写时代华章，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民族发展进步，这是一个命题。由白庚胜、和良辉主编的“纳西族现当代作家作品选集”40册丛书，给了读者答案。

小说：星云斑斓，承前继后，深耕脚下土地呈现出多彩多姿。

新时期以来，纳西族涌现了以142部长篇历史小说震惊文坛的小说家王丕震，还有多位有影响力的小说家。通读丛书，欣然看到，无论是最早期的李寒谷小说，还是改革开放后风生水起的王丕震、戈阿干、杨世光、和家修、杨正文、蔡晓玲、和晓梅、和振华、牛耕勤、和洁花、和风群等作家作品，都展示出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等特点，新历史主义、写实主义、魔幻主义、先锋小说也四轮并驾齐驱。以王丕震为例，《木天王》中木氏的雄才大略，《博士洛克》中洋大人对纳西文化的痴迷，《李汝炯》中主人公的刚正不阿等等，波澜壮阔的历史烟雨在其心中徘徊，让人叹服其渊博的历史知识与小说技巧的高超融合。

其他纳西族的作家也用特立独行的风格、深厚的生活积累、优美的语言和生动曲折的情节，精细化讲述了各个时代的精彩故事。其中，李寒谷的小说，用旧中国的黑暗反照新中国的光明和沧桑巨变。沙鑫入选丛书的9篇短篇小说，篇篇精致，以《纳西汉子》为例，小说描写纳西男人普遍的“一根筋”和嫉恶如仇的性格，写出了“性格决定命运”的内涵。杨正文和牛耕勤的东巴小说《远古探幽》引人入胜。以《东巴妹妹吉佩儿》等小说引人关注的和晓梅也后来居上，并以其擅长的女性题材，将女性视角和对纳西文化的现代性思考结合起来，以强劲想象力处理灵魂、生死、记忆、爱情等众多主题，揭示了人性的柔软和深邃。她的小说《呼喊到过的距离》斩获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和洁花的小小说延续了女性风格，她的《花马谷的女儿》从纳西族盘神九兄弟开天、姆神七姐妹劈地传说作引子，引出花马神和骑白马的阿普三多神，从桥头村到花马村，塑造了阿莲、阿萨命、康秀、秀梅等众多栩栩如生的事物。

丛书里还有很多作家都是多面手，他们的作品，有的篇幅小、量能大、技巧高、寓意远，注重细节，从油盐醋酱五谷杂粮和七情六欲之中，拷问生命，凝视生存，提炼出生动故事，用现实主义主旋律生动地描绘人民群像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呈现出小说鲜明的民族性、多样性、现实性和浓郁的地域文化。

散文锦心绣文，气象万千；诗歌雅俗共赏，穷尽山水。

纳西人自古尚武崇文，千百年来，经木府门前石碑坊上雕刻的“天雨流芳”（纳西语读书去吧之意）四个大字滋润，出现了代代相承的作家群体。纵观文丛，散文作品洋洋大观，众多作品形神皆聚；多样共生、和而不同。从上世纪50年代起步文坛的牛相奎、木丽春到新时期活跃于文学天地的杨世光、白庚胜、杨福泉等作家，他们皓首穷经引经据典笔耕不辍，入选丛书的散文，或发表于《人民文学》《民族文学》《文艺报》等报刊杂志，或发表在《北欧时报》等海外书刊。值得一提的是，以和国才、沙鑫、夫巴、张北星、杨正文、和振华等为代表的纳西族文学“怒江现象”，根扎故乡花开异乡，他们当中走出了4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们纵笔抒怀纳西儿女四海为家建设边陲的凌云壮志。其中，将军作家和国才本色是诗人，我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读过他的作品，他用诗性语言讲述怒江往事。从怒江起步的沙鑫，其文采飞扬，才情毕露。杨正文情景交替回望第二故乡，大有赤子之心，乡土气息浓郁。和振华“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散文，水到渠成如风情万种的大峡谷。夫巴的军旅作品叱咤风云风起云涌，张北星的怒江大峡谷风情散文，让人耳目一新领略到东方大峡谷



的基础上，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石一宁有深厚的文化情怀和文化品格，肩负着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使命感。《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以民族文学研究为主线，从民族文学理论到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体裁的研究，展现现当代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样态。他不仅关注玛拉沁夫、阿来等大家，也关注王华、雨燕、和晓梅、李新勇等作家，为这些作家的成长不停地鼓舞，甘当人梯和使者。有浓厚家乡情结的石一宁，始终关注着本民族作家和八桂大地的文学创作。对黄佩华、任君、光盘、冯昱、陶丽群等广西作家有着深入的研究。他满怀对少数民族的热爱，倾情指导广西各民族文学的创作与发展。

作为一位卓有建树的理论家和评论家，石一宁追求评论的广度与深度的兼容，在宏阔的视野里审视作家的作品，从历史的、人性的、社会的层面深入到作品

肌里，挖掘作家创作的深层文化内涵，从一代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探寻，表现出纵深的历史感。他分析阿云嘎的长篇小说《满巴扎仓》时，强调满巴扎仓是蒙古族历史生活与历史文化的象征；把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看作是一部“以文学形式书写的历史，兼具历史与文学的双重品格”的作品；在玛拉沁夫的《爱，在夏夜里燃烧》中，他看到普通人物在大灾难面前仍能坚持人性向善的美好品质；分析和晓梅的长篇小说《宾玛拉焚烧的心》中的宾玛拉家族的几位主要人物时，看到他们身上人性与神性兼具的特征。石一宁的这种评论方法，不仅是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放大，还意味着对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历史的辩证理解，迸发出智慧之光。石一宁以敏锐的视角和理论穿透力，从作品中所展示的人的生存状况的生动图景中，看到其所具有文学之外的认识价值和意义。

石一宁的文学评论实践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始终关心着文学的现实发展，从没有脱离中国文坛现实的场域，自始至终在中国文坛上参与着民族文学的成长。石一宁民族文学研究的突出价值，在于他对当代文学整体存在的相伴相生相助意义的揭示，在于他作为见证者、参与者、研究者、命名者与民族文学构成的血脉关系。作为民族文学的在场者，他风雨兼程，以敏锐的直觉和深邃的思想，呈现出文学评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为当代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评论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料，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石一宁的批评实践在当今的意义，还在于他品格风范的感召力。作为民族文学现场的守望者，他的批评语言朴实中有个性，散发着真诚和善意。他的评论既平和谦逊，又高屋建瓴，在张弛有度的评论节奏里散发着独特的学术感知。

石一宁对民族文学现场的驻足凝视，有着沉潜于民族文化纵深的民族自信，有着从边缘的仄径中跨越出的文化自信，这一切在他的不少评论作品中倔强地展示着。他的学术愿景和精神命运彼此呼应，表现出不断探索创新的努力，在文学评论上突进生命肌理，直抵灵魂深处。石一宁以耽于内省体验的文学精神，坚守民族文学现场，守望共同的精神家园。



的雄奇壮美和人神共居的独特人文。

我还在丛书散文百花园里，欣赏到开得鲜艳夺目的朵朵花儿，其中，白庚胜的作品，无论其题材广泛性还是思想性艺术性哲理性，都达到了一定高度。而以民族文化大散文见长的杨福泉，代表作品长篇散文《殉情之都》《李霖灿发掘玉龙雪山》《沈从文留在玉龙雪山的惆怅》《八年鸽友阿老乖》等，让人扼腕长赞击节叫好，其作既有田野气息，又有历史文化之典。

王夫之《俟解》里说“圣人以诗歌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圣贤”。惊艳了三千年的汉诗传到纳西族地区，形成《明史·云南土司传》称：“云南诸土官，知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诗歌走进现代当代，可谓人才辈出、诗香四溢。收入丛书的赵银棠、杨世光、白庚胜、杨福泉、杨琦、和克纯、和剑猛等诗作，清丽风雅让人传诵。

《蓝天畅想曲》《遗产》《相思树的传说》《祭黄帝大典文》《丽江礼赞》《纳西颂歌》《挽歌》《盘歌》《磋拜图》《北岳歌》《玉龙雪山》《纳西人》等诗歌曾发表于《诗刊》《人民日报》等刊物，捕捉新形象新意象，洞察凝练成优美的文字绝句，见证、参与、讴歌新中国成立以来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改天换地的聲音，用诗歌感动读者、感动中国。

这些诗歌让读者看到诗人的生活智慧、精神出处和记忆痕迹，但他们不仅仅停留在“自然景观”、“民族文化”、“农耕经验”、“游牧文明”“生态伦理”、“家园情结”、“历史想象”等方面，而且突破山地高原地域性局限，恰如其分地处理诗人的想象空间和象征场域，把时间意识和个体生命体验与想象关联在一起，把修辞化、想象力和真实性融会贯通，将个人日常经验提升和转化为共通经验乃至历史经验。

评论：天地立心，民族元素，远近高低各不同。丛书中的文学评论部分，我重点阅读了丽江师专教师和克纯、周文英、和建华的“学院派”文学评论文章。和克纯教授收入丛书的《纳西历史与文化的庄严颂歌》《如鲜花一样芳香的诗》等评论文章，具有较强在场感和前瞻性，阐释着纳西族诗人的作品风格和走向，赏评着前道基等兄弟民族作家的佳作，体现了民族文学的交融与互动。而作为学者的周文英有着扎实的理论功底，用回望的眼光，诠释着纳西文学乃至华夏文学的精彩。后起之秀和建华，则以初出茅庐不怕虎之锐，开疆拓土纵横驰骋品评着文艺作品。他的《论明清时期纳西族文学的审美发展》《“错位”的文学理念与当代

一个诗人要是能够在他年轻的时候走遍藏地，并且写下令人垂涎的诗篇，那该多好呀。

在我看来，张子选做到了。这是我在读完他新近出版的诗集《藏地诗篇》后的感悟。240首诗歌的书写，或远或近，或浓或淡，藏地留给心灵的迹象总是明晰可辨。客观存在一旦内化为精神书写的自由，生命的量就有了质的跃变。他是令人艳羡的。我们勿需具体地打听他在藏地游历都遇见了些什么，他的经历都沉淀在《藏地诗篇》里，比任何言语都更具说服力。

古岩画上的人们/分布在巨大的岩石上/他们紧贴着那些岩石/陡峭地生活或者歌唱/用羽毛装饰过的响箭/射杀一只秋天的灰狼/有时也一声不响/凝思更高的地方……

这首被广为传布的《阿拉善之西》，写于诗歌风潮汹涌的1986年3月14日，明显带着那个时代的热血和诗情观念。作为张子选早期的诗歌代表作之一，这首诗歌的标题本身就兼具诗意的召唤力。阿拉善之西作为地域名称，它在确指和泛指之间生长出的诗歌启发力是强劲的。诗句的语言朴实不张，细致体味后，看似浅显的字面下意味却很丰赡辽远。我们不必探听这首诗是诗人现场的感动或者只是一次灵光一现的产物，让人知足的是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在阅读中陷入诗歌情景。一次野炊抑或只是一个梦境，与其说诗人给我们还原了一次旅行，解读了岩画上栩栩如生的画面，毋宁说他帮我们揭示了人与物与生俱来的互利共生的因缘，阅读中确乎能够激发出“物我俱化，物我两忘”的高古境界，诗歌意境中隐约透露出来的古雅的喧嚣散发出一缕芳香的生活气息，很难说今夜的我们不是从岩画上徒步走下来的。

1983年到1989年，在甘肃阿克塞中学任教的日子里，青年诗人张子选以自己的在场写作，一次又一次介绍了西部鲜活的精神血脉，扩展了西部新边塞诗创作艺术的堂庑。无论时光怎样流逝，身世如何辗转颠簸，青春岁月存储下来的诗歌宝藏默默富足了他的往后余生。

多年以后，已近耳顺之年的张子选回忆起在阿克塞的岁月，提到了另一个天才诗人。

1988年夏天，诗人海子由甘肃赴西藏途中，在阿尔金山脚下疲惫地走下长途客车，携带一张介绍纸条一路风尘来到阿克塞中学找张子选，不巧的是适逢暑假，张子选已经回兰州了。海子去世20年，张子选在北京自己的租赁屋里写下一首诗歌垂首追怀。在这首表面波澜不惊的诗中，他不事张扬地写道：“……大家抬起头，你跌倒在自己的命运中/正当别人走近自己，你却干脆选择放弃/我只好歪着头，盯着一个时代的侧面……”如果那一次的私窥得以变现，那日后留给中国诗坛的海子离世事件是否会有些许变数，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评说。

因缘如此，海子充满神秘气息的抒情风与张子选的洗炼清奇或许还隔着一段距离，就像两人当时分别居于两地，虽然偶有互访的念头，大多时候也只能遥相呼应。作为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亲历者，毫不夸张地说，相互走动造访是彼时诗歌圈子的一种风尚。

也是1988年春天，我曾在成都西南财经大学举办的诗会上有幸目睹南行的海子。一面之缘，之前有所耳闻，但那时他的诗名还没有今天这般响亮，所以并没有生出主动与之交谈的热望。当美丽的女主持人邀请来自北京的海子上台讲话时，他腼腆地匆忙摆手的一幕我至今记得。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已经通过阅读张子选大量的诗歌，确立了对他书写的认可。我把张子选归入西部新边塞诗人群体中的佼佼者，并且，时常因为该群体没有得到应有的推崇而为之鸣冤叫屈。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能与朦胧诗群并驾齐驱的诗歌群体。当然，与朦胧诗不同的是，新边塞诗群侧重于诗歌写作的地域性质，似乎没有统一的诗歌艺术主张。

也许，面对天高地远的西部边塞，任何主张都略显捉襟见肘，自由不羁才是诗歌的王道。

藏地的风土人情，藏地绚丽多姿的文化，这一切每每令慕名而来的旅人赞叹不已。我无法查证张子选藏地游历的时间、次数，但我可以从他的诗歌写作中体味到他一再的感动和惊喜。

“当我们提及西藏时，首先应去神秘化。”《藏地诗篇》序言记载诗人张子选如是说。从表面上看，这和大多数游历藏地者的感想迥然相异，也可能落空兴致勃勃将要前去游历者的期待。但权衡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在几经“翻覆若波澜”后的了然，是崭新层级的“看山是山”。消除了预设的神秘，藏地才在张子选的诗篇中袒露出无比鲜活的力量。

在题为《哭》的诗歌中，张子选写到：“多年来我放牧诵经，睹物思人/而扎西在宴客，卓玛在摇铃/正当青海湖抱住青海/西藏抱住喜马拉雅/我手掌上正驰过一头秋天的/丧失一切的精壮牦鹿。”其中有现实的摹写，也不乏对神秘气息的捕捉。清楚无误的是，这种神秘不是来自于物理世界，而是来自于心灵的感应，是植根于情感和思想的超拔，已经不囿于物质束缚，渐臻于精神的圆融。这种抽象和剥离后形而上的美，远比具象的审美空间要大。

因为抛弃了概念化的先入为主，诗人张子选拥有了贴近真相时难能可贵的自主和从容，已有的诗歌素养在这方天地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宛如骏马驰骋，找到了诗歌翠绿无际的草场。触景生情，天地古今一脉相通：“雨季，马帮过境处/灌木与野草身躯让出的山径/无论向上抑或向下，古往今来/都蜿蜒着一路的陡滑。”（诗集《藏地诗篇》第368页）

进入藏地的无人地带，一阵阵孤独感袭来，诗人张子选甚至相信石头上会长出树来，相信自己面前的石头是一些棕色皮肤的小孩。因果还在，上师还在，藏医家中摆放着一只鸟的飞和一只鸟用剩的全部天空还在。一个个体象的数字通过诗人温暖的诗获得了诗歌的确认。

在一首叫《与时间有关》的诗歌中，诗人写道：“几匹黄叶满地霜。爱人，是你吗？心似寒秋独自凉。佛啊，你在吗？”这是无与伦比的孤独，拥有灵魂痛彻的力量。多年以后，就在张子选写给海子的那首诗中，依然还冒出了这样的句子：“只有孤独的来自能够聆听静默。”

诗人的孤独感不是来自地理上的荒无人烟，基本上与撇取的藏地山水人物也关系不大。这种孤独感与生俱来，是人存在的一部分能量，诗人因其天资占有的份额会更足。不是吗？诗人张子选一直试图在拍摄灵魂里熟睡的另一自己，笃信“世间有你，不枉我来此一遭”。执著的诗句像轻声的呼唤，更像是灵魂的呢喃：“由于相信你在，我不能不认真来一回的‘人间’；”“羊里高卧我的羊，人中不缺我的人”。即使是到了北京，过着“内心常有波澜，生活基本平静”的生活，他诗歌的旅行还是没有终止。大多数时候，他是在“北京的东五环路，神游至藏北以远”，偶尔，他的神游也在深圳或者兰州这些地方借助由自主的诗写发生。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在诗人张子选与藏地之间，王国维的这个阐释可以算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注解。

资源富集的藏地不仅提供了用之不竭的诗歌素材，也强化了诗人的诗歌观念。此外，因果善恶、静与空、腰身与牧场、鹰与马，这些随处可见的词给诗集挹注的新奇是不言而喻的。拟花儿、拟禅诗、拟藏谣等诗写方式的借鉴使用，也让张子选对藏地的表达显得游刃有余。

在诗人的经历中，藏地，在遍历广观之后，离开了那么久，终究做不到了无牵挂。城市，在闯荡寓居之中，来了那么久，热情的诗写却迟迟未到。这是为什么呢？或许可以不揣冒昧，暂且把诗人张子选说的这句话作为一个回答：“一百辆汽车，也比不上一匹马。”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时间。我们至今缘湄一面，期待有一天能得到他当面确凿的回答。

——读张子选诗集《藏地诗篇》 □阿苏越尔

## 一百辆汽车，也比不上一匹马